

华人移民视角下闽粤客方言在印尼的传播^{*}

单韵鸣¹, [印尼] 黄蓉玲²

(1. 华南理工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2.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提 要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华人人口较多的国家之一, 印尼华人所使用的汉语方言以闽、粤、客方言为主。为了全面探究华人移民在印尼对汉语方言的传播, 本文综合使用文献和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调研等方法, 梳理了华人移民在印尼的流布, 从人际和群体语言、组织语言、公共语言和跨文化语言多个维度描写闽、粤、客方言在印尼的传播。研究发现: (1) 汉语方言在多个场域都是华人仅次于印尼语的交际语, 在家庭域和华人家庭聚会上更超越印尼语, 显示出最大的活力; (2) 汉语方言也有向印尼本地人传播的迹象; (3) 闽南话和客家话保留较好的代际传播链条, 粤语的代际传播出现危机, 汉语方言活力强弱差异导致方言转用的出现; (4) 汉语方言在印尼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 其传播动力主要依赖于华人对祖籍地的情感依恋; (5) 汉语方言承担了印尼华人身份认同、祖籍地情感纽带、华语学习催化剂、交际工具、华族文化印记等多种社会功能。

关键词 印尼; 华人; 移民; 汉语方言; 海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 (2025) 02-0023-13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50203

A Study of the Spread of Min, Yue and Hakka in Indone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Immigrants

Shan Yunming and ANGELINE

Abstract Indonesi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of Chinese who mainly use Min, Yue and Hakka.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the spread of these Chinese dialects in Indonesia. With the employment of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documents,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field surveys,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spread of these Chinese dialect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Chinese dialects are more widely used than Indonesian in the family domain, and act as the second lingua franca in other domains. 2) There are signs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dialects among local Indonesians. 3) Inter-generation transmission is strong for Min and Hakka but weak for Yue, an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language vitality result in language shift. 4) As a kind of bottom-up language spread, the spread of Chinese dialects in Indonesia depends on the emotional attachment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to the land of their ancestors. 5) Chinese dialects play multiple roles in Indonesian Chinese identification,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the land of their ancestors, Chinese learning, communic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Indonesia; Chinese; immigrants; Chinese dialects; overseas spread

^{*} 作者简介: 单韵鸣, 女,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社会语言学、语言文化传播。电子邮箱: ymshan@scut.edu.cn。黄蓉玲 (ANGELINE), 女,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电子邮箱: angeline1999@163.com。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南洋华语语法描写与区域比较研究”(22JJD740025)。

一、引言

近年来,海外华语以及海外汉语方言被视为海内外华人社区文化认同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纽带,是极为宝贵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庄初升 2022),更是一种文化遗产(郭熙,雷朔 2022),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海外华语及海外汉语方言可统称为中国话,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华人迁移至海外所在地时带过去的(郭熙 2023)。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是世界上华人人口较多的国家之一。据 2010 年《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印尼华侨华人总数估算在 1000 万以上。^①关于华人在印尼的流布,文献表明,中国自汉代起即与印尼有交往(李学民,黄昆章 2016)。约在公元前 1 世纪已有华人在苏门答腊定居(郑一省 2016;鲍立刚 2022)。根据庄国土(2008)和 Lim & Mead(2011),华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始于 17 世纪,有四大移民潮,分别为 17 世纪初至 19 世纪中叶、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20 世纪初至 50 年代初、20 世纪 80 年代起及后。第一批移民主要是来自福建省的商人;第二批移民潮,潮州人、客家人和广府人等开始大量抵达印尼,特别是在爪哇的港口;第三批移民潮,福建人主要移民到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第四批移民潮,福建人在印尼亲友的帮助下,成批前往印尼。

华人现在在印尼的地理分布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第一批移民的流布(Ananta et al. 2008)。“福建帮”是印尼最大的华人族群,福建籍的华人主要居住在爪哇和苏门答腊;潮州籍华人主要聚居在西加里曼丹、廖内群岛,以及杂居在爪哇地区;客家人则主要聚居在西加里曼丹、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在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苏门答腊的邦加岛和勿里洞岛人口比例较高;广府籍的华人移民时间较晚,散居在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各地(杨启光 2000;Ananta et al. 2008)。中国话伴随着华人移民的迁移而流播世界各地,印尼华人祖籍主要来自福建、广东,所使用的汉语方言自然以闽潮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为主,方言的流布也与这些华人族群的地理分布一致。

由于印尼的华人移民基本来自中国南方,而南方方言种类繁多,有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因此,印尼是汉语方言在海外传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从华人移民的视角探究闽、粤、客方言在印尼的传播有助于管窥汉语方言在全球传播的路径和情形、汉语方言在海外华人社区的社会功能、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从而为中国语言文化对外传播、海外华人祖语传承和家庭语言规划、海外中国语言资源和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

目前已有较多的研究关注印尼华人语言使用和祖语传承的情况。关于祖语传承,较多文献探讨了印尼华人的华语学习和使用及其与身份认同的联系。涉及印尼汉语方言的,有几个不同的分支:(1)在以华语为主体的研究里涉及汉语方言的使用或分布(郭熙 2023;林瑀欢 2021;徐天云 2012;王爱平 2006;等等),或关于某个地区方言的保持或选择(Wijaya et al. 2020;Nasution & Ayuningtyas 2020);(2)不同汉语方言在印尼的濒危级别(陈晓锦,郑蕾 2009);(3)印尼汉语方言的语音和词汇变异(陈佩英 2008;高然 2000;吴忠伟 2017;陈晓锦 2012);(4)印尼语中的汉语方言借词(唐根基 2016;FITRI WILIM(林瑰丽) 2016;陈玉兰 2012;李如龙 1997;孔远志 1986)。

^① 参见: <https://qwgzyj.gqb.gov.cn/yjyt/155/1830.shtml>。

已有成果多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本体视角出发, 语言传播视角的文献较少。库珀 (Cooper 1982: 6) 对语言传播的定义是: 某个交际网络为了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而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范围不断扩大。郭熙 (2021, 2023) 指出, 有移民就有传播, 并认为海外华语传承中一直有传播相伴, 因为传承是一种代际的、纵向的传播, 而传播是语际的、横向的。本文所指的语言传播是广义的, 既包括纵向的代际传播, 即常说的“传承”, 也包括横向的语际传播, 而传播是语际的、横向的。因而, 为了在传播方向上有所区分, 下文把纵向的传播称为“代际传播”, 把横向的传播简称为“传播”。

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 人作为传播者和接受者, 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了全面探究华人移民在印尼对汉语方言的传播, 本文综合使用文献和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调研等方法展开研究。

文献调查方面, 笔者通过文献查阅和梳理, 概述印尼华人移民史、华人人口和方言的流布、华校教学语言演变等 (见引言部分及三 (二))。

问卷调查方面, 笔者 2024 年 1~2 月在印尼朋友的协助下, 通过滚雪球的方法, 面向雅加达、棉兰、坤甸 3 个较有代表性的城市^①发放问卷, 共回收有效问卷 227 份。城市样本占比依次为 43.17%、32.60% 和 24.23%; 男女样本占比分别为 34.36% 和 65.64%; 35 岁以下青年占 79.30%、36~65 岁中老年占 20.70%, 样本新生代占大多数。他们的祖籍地分别是福建 (39.65%)、广东 (30.84%)、海南 (5.28%) 和其他 (24.23%)。属于第一、二代华人的 6.61%, 第三、四代的占 42.73%, 第五代或以上的 16.30%, 不清楚的 34.36%。本科以下学历占 29.07%、在读和已毕业本科占 64.76%、研究生占 6.17%。问卷除了采集人口统计学信息和样本的母语、身份认同、语言态度等数据以外, 还利用斯波斯 (Spolsky 2009) 提出的语言管理框架, 分家庭域、学校域、宗教域、工作域和公共域调查印尼华人的汉语方言实践, 以便细致展示汉语方言在不同场域的传播现状, 探究语言传播与身份认同、语言态度的互动。

访谈方面, 形式为半结构式访谈。我们经过朋友推荐和在印尼华人微信群里召集受访者, 挑选出 7 位被访者进行面对面或线上电话访谈, 旨在了解其家族移民史、个人语言信念、语言实践和家庭语言管理, 以补充问卷调查发现或深挖背后原因。被访者来自印尼不同的地区, 年龄跨度从 20 岁到 71 岁, 从第 2 代到第 26 代移民, 确保包含了闽、粤、客不同方言背景, 且每种方言都有至少两位分属青年和中 / 老年不同年龄段的被访者。

实地调研方面, 我们走访了雅加达的商场和棉兰的集市, 细致观察了店铺的招牌和菜单, 记录汉语方言相关的语言景观, 了解汉语方言在公共场域的传播。

最后, 我们使用拉斯韦尔 (Lasswell 1948) 的 5W 传播模式勾勒了印尼汉语方言的传播。

三、闽粤客方言在印尼的传播

语言传播的类型包括人际语言传播、群体语言传播、组织语言传播、公共语言传播和跨文化语言传播 (周芸, 崔梅 2015)。人际语言传播指的是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的过程, 既包括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口语传播, 也包括通过文字组织的语句传播; 群体语言传播主要是指群体成员使用语言符号交流信息的活动; 组织语言传播是指以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 公共语言传播是指利用大众媒体, 如报

^① 选取的 3 个城市以前人对印尼汉语方言分布的研究为主要依据 (郭熙 2023; Nasution & Ayuningtyas 2020; 沈玲 2015; 徐天云 2012), 同时考虑 3 个城市在不同地区的代表性。

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传播信息的过程；跨文化语言传播是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和信息的交流和传播过程。

根据以上定义，华人在不同场域的汉语方言使用属于人际和群体语言传播；由学校、培训机构等向学生教授汉语方言的属于组织语言传播；在印尼媒体或公共场所的汉语方言景观属于公共语言传播；汉语方言被引入印尼语、在印尼产生的变异属于跨文化语言传播。

(一) 人际和群体语言传播

1. 汉语方言的代际传播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母语为单语的占 50.66%，双语的占 25.55%，多语的占 23.79%。其中，母语单语为印尼语的占 27.31%、汉语方言的占 22.03%，两者相差不太大。以汉语方言为母语单语的华人，讲福建话（即本文的闽南话，下同）的最多，其次是客家话、潮州话，样本中没有人母语单语为粤语。

以印尼语和汉语方言母语为双语者占总样本的 17.62%，汉语方言的排序和单语者一致。包含 1 种或多种汉语方言的多语者占比高达 20.71%（15.86% + 4.85%），其中讲福建话的 35 人、客家话的 10 人、潮州话的 8 人、粤语的 7 人。母语多语者除了大多数讲汉语方言，通常还包括印尼语、华语和英语。

综合母语单语、双语和多语者的数据，母语含汉语方言的总占比为 60.36%，仅次于母语含印尼语的 68.28%，说明汉语方言能较好地代际传播到调查对象这一代。汉语方言的母语人数排序为：闽南话、客家话、潮州话、粤语。

表 1 调查样本母语分布情况

母语为单语（115 人，50.66%）					母语为双语（58 人，25.55%）			
汉语方言（50 人，22.03%）					印尼语 + 汉语方言（40 人，17.62%）			
印尼语	福建话	客家话	潮州话	粤语	印尼语 + 福建话	印尼语 + 客家话	印尼语 + 潮州话	印尼语 + 粤语
62 人 27.31%	30 人 13.22%	13 人 5.73%	7 人 3.08%	0 人 0.00%	21 人 9.25%	14 人 6.17%	5 人 2.20%	0 0.00%
母语为多语（54 人，23.79%）								
印尼语 + 1 种汉语方言 + 其他			印尼语 + 2 种或以上汉语方言 + 其他			印尼语 + 英语 + 华语 / 印尼本地方言		
36 人 15.86%			11 人 4.85%			6 人 2.64%		

注：篇幅所限，此表格仅保留含汉语方言的数据，去除 2% 以下的其他数据。

调查对象中，不同城市华人以汉语方言为母语的人数有明显差异。棉兰华人以闽南话为母语的 最多（89.19%），甚至高于以印尼语为母语的人数（54.05%）。坤甸以客家话为母语的也较多（41.82%），也有部分华人母语是潮州话（16.36%）。相比这两个城市，雅加达以印尼语为母语的人数 压倒性地多于汉语方言；汉语方言当中，以闽南话为母语的人数最多（20.41%），客家话、潮州话也 有母语者，见表 2。此调查结果和前人的调查（徐天云 2012）略有不同，即雅加达华人并未完全同化， 不同方言仍有保留。棉兰和坤甸 4 种方言都存在代际传播链条，尽管强弱有别；而雅加达的样本中， 没有人母语是粤语，粤语在大城市的代际传播链条似有断裂的趋势。

表 2 不同城市华人母语比较表

	印尼语	汉语方言			
		福建话	客家话	潮州话	粤语
雅加达 (98 人)	85 人 86.73%	20 人 20.41%	12 人 12.24%	9 人 9.18%	0 人 0.00%
棉兰 (74 人)	40 人 54.05%	66 人 89.19%	5 人 6.76%	2 人 2.70%	5 人 6.76%
坤甸 (55 人)	35 人 63.64%	6 人 10.91%	23 人 41.82%	9 人 16.36%	2 人 3.64%

注：母语选择为多选题，百分比总和会出现超过 100% 的情况。

2. 汉语方言在不同场域的使用情况

(1) 家庭域

调查对象在家与不同的家庭成员交际，汉语方言的使用率最高，全部超过 60%，尤其是与祖父母交际时，方言使用率接近 70%。其次才是印尼语，然后是华语，最后是英语。数据充分展示了汉语方言在华人家庭的重要性，见表 3。

表 3 家庭域语言使用率 / %

交际对象	汉语方言	印尼语	华语	英语
父亲	61.23	56.39	15.42	6.17
母亲	66.08	53.74	15.42	5.29
祖父母	67.40	40.97	19.82	0.88
其他家人亲戚	62.56	56.39	14.54	7.05

(2) 学校域

在学校使用最多的是印尼语，但汉语方言的使用也不少。调查对象与华人同学交际时，使用方言的超过五成，也有接近五成与华人老师交际时会使用方言，且使用率比华语高出不少。^①有意思的是，也有少数华人与本地同学使用汉语方言（22.47%）和华语（11.01%）交际的情况，说明方言和华语从华人群体传播给当地群体。可见，尽管印尼语使用最广泛，但汉语方言在学校域也是重要的交际语言，见表 4。

表 4 学校域语言使用率 / %

交际对象	印尼语	汉语方言	华语	英语
本地同学	92.07	22.47	11.01	14.98
华人同学	64.76	54.19	22.55	14.98
华人老师	67.40	48.02	29.52	12.78

(3) 宗教域

总体上印尼语在各个宗教场所都占主导地位，但汉语方言的使用比华语和英语要多。其次，虽然信仰佛教和孔教的华人在宗教域使用汉语方言比信仰其余 3 个西方宗教的要多得多，方言仍然被华人

^① 这与林琄欢（2021）的调查结果部分不同，原因可能是林琄欢调查的学校不少是学习华语的学校、交际对象涉及华文老师、选项设置为单项等。

传播到西方宗教场所。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宗教场所，华人使用汉语方言（53 人、14 人）甚至比使用英语（24 人、10 人）还多。与教友交际，特别是与年长的教友交际时比祭拜或做礼拜时使用方言更多。数据表明在宗教域，汉语方言仅次于印尼语，也是华人重要的交际语言，使用比华语更多，见表 5。

表 5 宗教域语言使用情况

	交际对象	印尼语	汉语方言	华语	英语
佛教 (105 人)	年纪相当的教友	72.38% (76)	62.86% (66)	14.29% (15)	10.48% (11)
	年长的教友	69.52% (73)	64.76% (68)	15.24% (16)	7.62% (8)
	祭拜时	63.81% (67)	50.48% (53)	31.43% (33)	5.71% (6)
孔教 (18 人)	年纪相当的教友	88.89% (16)	50.00% (9)	5.56% (1)	0% (0)
	年长的教友	83.33% (15)	61.11% (11)	5.56% (1)	0% (0)
	祭拜时	77.78% (14)	50.00% (9)	16.67% (3)	0% (0)
基督教 (75 人)	年纪相当的教友	92.00% (69)	28.00% (21)	12.00% (9)	9.33% (7)
	年长的教友	89.33% (67)	30.67% (23)	10.67% (8)	6.67% (5)
	做礼拜时	92.00% (69)	12.00% (9)	12.00% (9)	16.00% (12)
天主教 (22 人)	年纪相当的教友	81.82% (18)	22.73% (5)	9.09% (2)	18.18% (4)
	年长的教友	81.82% (18)	27.27% (6)	4.55% (1)	9.09% (2)
	做礼拜时	81.82% (18)	13.64% (3)	0% (0)	18.18% (4)
伊斯兰教 (6 人)	年纪相当的教友	83.33% (5)	0% (0)	16.67% (1)	0% (0)
	年长的教友	83.33% (5)	16.67% (1)	0% (0)	0% (0)
	做礼拜时	83.33% (5)	16.67% (1)	0% (0)	16.67% (1)

(4) 工作域

在工作域印尼语同样占主导地位，但使用汉语方言与华人同事交际的也超过五成，也有约为三成的调查对象使用汉语方言与本地同事交际，不管是华人还是本地同事，与年长同事比与同龄同事使用方言更多。在工作域，华人与同事也使用华语交际，但使用率低于汉语方言，与同龄或年长的同事使用频率差异很小。总体来说，工作域和宗教域的语言使用情况比较相近，见表 6。

表 6 工作域语言使用率 / %

交际对象	印尼语	汉语方言	华语	英语
同龄的本地同事	85.02	27.31	11.45	10.57
年长的本地同事	78.41	34.80	11.89	8.81
同龄的华人同事	67.40	53.74	21.59	11.01
年长的华人同事	63.44	55.95	20.70	9.69

(5) 公共域

印尼语在所调查的大多数公共域是主流交际语，即使与中餐厅华人服务员或集市人员交际，调查对象仍倾向于使用印尼语。有一情况例外，就是华人家庭聚会，使用汉语方言的比例比使用印尼语高出近 20%。在华人家庭聚会这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汉语方言发挥出最大的活力。在公共域，与年长或同龄人交际，使用方言没有差别，均接近五成。华语在各个公共域的使用仍明显少于汉语方言，在华人家庭聚会或在中餐厅与华人服务员交际时，使用华语的比例明显提高，见表 7。

表 7 公共域语言使用率 / %

交际对象	印尼语	汉语方言	华语	英语
华人家庭聚会	53.30	71.81	19.38	3.96
同龄的邻居或朋友	83.70	48.46	11.45	11.01
年长的邻居或朋友	82.82	48.46	10.13	8.81
中餐厅华人服务员	72.25	45.81	21.59	7.05
集市人员	85.90	39.65	8.37	3.08

上述结果表明，印尼华人母语双语多语并存的情况较常见（49.34%）。除了当地语言，印尼华人通过家庭的代际传播，较好地保存了祖籍方言，一受访者说：“我从小到大都使用汉语方言与家庭成员交流。”良好的家庭语言生态，对延续汉语方言的海外生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语方言除了在家庭域占据重要地位以外，还被华人带到了学校、宗教、工作和公共场域，成为使用度仅次于印尼语的语言。华语在各个场域的使用都不及汉语方言。在某些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如华人家庭聚会），汉语方言发挥出最大的活力，其使用远超印尼语。

汉语方言的使用不局限于华人群体，也会出现在华人与非华人之间。两名受访者提到他们与非华人朋友说闽南话和客家话的情况，“我们市场做生意，就是棉兰来的嘛，因为在老家就是他们（指当地非华人）喜欢说福建话嘛，他们都是学嘛”“即使他们是马杜拉（北爪哇地区）人，他们也能说流利的客家话……因为客家人不会说印尼话，他们只是从客家人那里听他们说，他们可以从那里学到（客家话）”。这两个例子反映出，闽南话和客家话在特定区域非常通行，实现了向当地人群体传播。

另一方面，基于不同汉语方言的保持和通行程度不同，华人社群内部会出现方言转向的现象。调查数据显示，闽南话保存最好，客家话次之，粤语最不乐观。两名分别为客家籍和广府籍的受访者谈到，闽南话在棉兰十分通行，以至于祖籍不是福建的华人除了会讲自己的祖籍方言，也会讲闽南话，“在家里就说客家话，出去跟朋友就说福建话，在学校就说福建话”“有时候不说广东话，说的是福建话或华语，但和我妈妈和外婆在一起时有时会广东话”。甚至还会出现原本的祖籍方言逐渐消融的情况。如客家籍受访者谈到“更多说福建（话），家里没有客家人，我的老公就是福建人，哪里会听（客家话）”；广府籍受访者说“我想只有我家使用广东话。其他家庭可能也有，但我很少听到他们说广东话……他们的祖先也是广东人，但他们好像不擅长说广东话”。这提示研究者，应根据不同方言的传播情况实施针对性的语言保持策略。

（二）组织语言传播

华文教育属于组织语言传播范畴。华人移民后在印尼创办了许多华文学校（以下简称“华校”），华校的教学语言使用可分为3个阶段：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转向华语教学，混合方言成分；华语作为教学语言。第一间传统华校创办于1729年。19世纪末，华校开始迅速增加，这时的教学媒介语为福建方言（廖健裕1978）。事实上，方言在早期华校或私塾作为教学语言是东南亚国家华校的普遍情况，新加坡亦是如此（李计伟2023）。

后来土生华人领袖潘景赫在1901年创办中华会馆学校（即八华学校），教学媒介语开始转变为华语，而不是福建话或其他中国南方方言（Dawis 2008），但在毕业式的演讲场合依旧会使用方言。据《新国民日报》1923年02月20日的一则报道，“山口洋培南学校举行的毕业式中，毕业生3人答词，一操英语，一操国语，一操南音，语颇流利，坐座者神为之一动”。此外，在印尼还有方言与普通话混合的语言，即“先达国语”。先达国语最初是一种以西南官话为基础的教学语言，它融合了其他语

言和汉语方言的特点,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印尼区域汉语变体(甘于恩,单珊 2013)。总之,在第二阶段,华校教学语言主体已转向华语,只是仍存在方言元素。

在印尼政府排华政策结束后,华文补习班是印尼华文教育的主力军(宋阿丽 2015)。2004年起,印尼的三语学校发展迅速(张小倩 2021)。不少公立学校也将中文课列为选修课之一。目前,印尼华文教育的主要形式有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以及华语补习班。此时印尼华文教育则完全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从华校教学语言的演变可知,汉语方言自 20 世纪以来一直较为缺乏组织传播渠道。

(三) 公共语言传播

1.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目前,印尼较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有《印度尼西亚日报》《印度尼西亚商报》《国际日报》《千岛日报》《印华日报》等。报纸主要以汉字作为信息载体,由于汉语方言缺乏规范文字,所以几乎不在纸媒上传播。电视方面,较有知名度的华文电视台有美都电视台、大爱电视台。前者使用华语播报新闻节目,后者则有使用闽南话的电视节目。

新媒体方面,笔者发现有印尼华人在 TikTok 或者 Youtube 等自媒体上使用汉语方言作为媒介语发布生活视频或教授汉语方言。例如,在 Youtube 上搜索“Bahasa Hokkien”(闽南话)、“Bahasa khek”(客家话)和“Bahasa kantonis”(粤语)即可找到不少印尼华人的方言教学视频;也偶见零星教学机构网站上有方言教学的网页。以上说明,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汉语方言的传播都比较有限,新媒体上大部分是华人个体的自发传播行为。

2. 语言景观

我们在雅加达和棉兰的商场和集市上观察,发现不少餐厅和店铺的名字有汉语方言元素,最常见的是以拼音的形式出现。^①如图 1 和图 2 所示,“Foek Lam”(福林)和“Lam Kwai Fong”(兰桂坊)是粤语发音的拼音形式。汉字方面,既有简体字也有繁体字。



图 1 餐厅名字“福林”(简体字,粤语拼音)



图 2 餐厅名字“兰桂坊”(繁体字,粤语拼音)

在棉兰的集市中,卖豆干虾煎的摊位上挂着的招牌使用汉字和闽南话发音的拼音“Tau Kua”(豆干)、“He Chi”(虾煎),如图 3 所示。

印尼的中国话语言景观有着较复杂的语言元素,包括汉字(繁体字和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汉语方言拼音等。中国话在印尼公共空间的展示表明华人将中国文化,包括语言和文字带到印尼,汉字与汉语方言已在不知不觉间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图 3 闽南话“豆干虾煎”招牌

^① 以汉语拼音出现的招牌也不少,本文只谈汉语方言的例子。

(四) 跨文化语言传播

华人在印尼生根，汉语方言随之被借入印尼语，借词分别来自闽南话、客家话、广东话，其中闽南话借词最多（孔远志 1986）。孔远志研究发现印尼语的闽南方言借词占全部汉语借词的 89.2%，借词类别涉及“蔬菜、水果、饮食类”“日用品类”“风俗习惯类”等 11 类。根据唐根基（2016）的统计，印尼语中共有 2052 个汉语借词，加减一词多音借词之后，共有 1839 个，其中汉语方言借词共有 1472 个（闽南方言借词 1397 个，粤方言借词 44 个，客家方言借词 31 个）。FITRI WILIM（林瑰丽）（2016）根据《印尼语大词典》的闽南话借词将其分成 31 类，认为闽南话全面进入印尼语，而不局限于某个方面；在借入闽南话时会根据印尼语的语音特征进行改造或简化，如改造闽南话的送气音、省略声调、简化拼写等。陈玉兰（2012）指出闽南话借入印尼语后，适应了印尼语丰富的词形变化，借入词汇可以和当地词汇一样通过添加词缀和重叠等语法手段改变词性或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

我们在实地调研时，也发现了借词及变异的实证例子。比如雅加达和棉兰的中餐馆，菜单上经常同时使用汉字和印尼语。图 4 为雅加达商场内美食街店铺“古香老家 BAKMI KOCA”的菜单，其中“Bakmi”是一种面条菜肴，来自闽南话，“Bak”指“肉”，“Mi”^①指“面”；“Tukha Bihun”也都来自闽南话，分别指“猪脚”和“米粉”。

图 5 为棉兰华人在路边所开餐厅的菜单，上面如“Cap Cai”“Bakso”“Puileng”“Tauhu”等来自闽南话“杂菜”“肉丸”“飞龙”“豆腐”的读音，也就是说，很多闽南方言词语通过印尼语拼音的形式直接使用到印尼语里，尤其是那些从祖籍地带来的物品，像菜单中的食物“Mi”（面）“Bihun”（米粉）“Bakso”（肉丸）等。



图 4 雅加达一面铺菜单（简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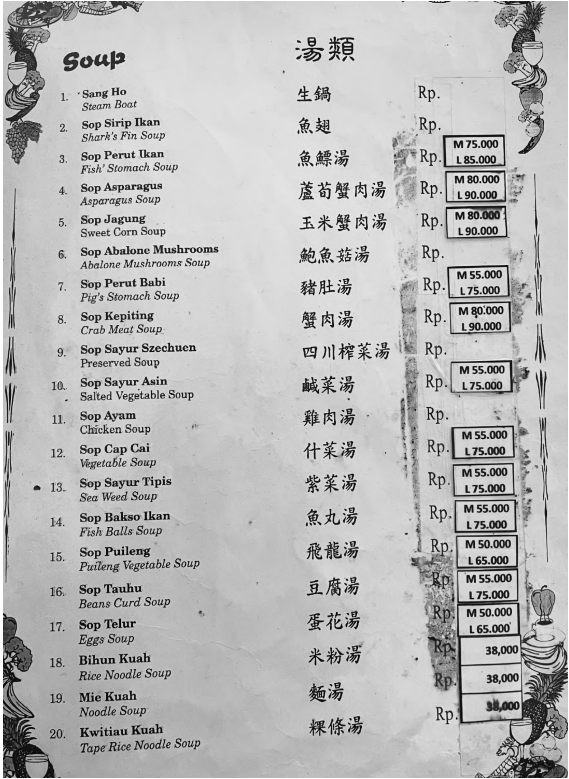


图 5 棉兰菜馆菜单（繁体字）

① “Mi”在非正式场合也被拼写为“Mie”。

菜单 18 ~ 20 的 “Bihun Kuah” “Mie kuah” “Kwitiau Kuah”, 中心语是 “Bihun” (米粉) “Mie” (面) “Kuitiau” (粿条), 来自闽南话, 印尼语 “Kuah” (汤汁) 是修饰语, 印尼语名词性词组语序为中心语在前、修饰语在后, 而菜名的汉字翻译就按照印尼语的语序直译为 “米粉汤” “面汤” “粿条汤”, 实则应对应汉语中心语在后的 “汤米粉” “汤面” “汤汁粿条”。这反映出印尼的汉语方言融合印尼语的特点后产生的变异。

文献材料和实证例子生动地反映了华人移居印尼而带来中印两国语言文化的交融。

四、汉语方言在印尼的社会功能

(一) 汉语方言是印尼华人的祖语、祖籍身份认同的标记

调查对象中, 认为自己是 “印尼华人” 的占比 (81.06%) 比认为自己是 “印尼人” (42.73%) 的要多, 说明华人对汉族身份的认同; 更有部分人同时认为自己是某祖籍或祖国籍的人, 如 “客家人” (12.78%)、 “福建人” (7.49%)、 “中国人” (7.49%)、 “潮州人” (2.64%)、 “广东人” (0.88%), ^① 进一步说明他们对祖籍身份的认同。祖籍身份和汉语方言是紧密相连的, 因为某个方言往往是某个地方属地身份的标识 (单韵鸣, 李胜 2018)。调查中分别有近 60% 的样本认为汉语方言是他们的母语或祖语; 访谈中不止一名受访者明确表示祖籍方言的重要性, “后来我生孩子了, 我都跟他们说福建话, 因为这很重要嘛……我们祖先就是福建人嘛” (客家话) 因为那是我们的母语……那是我们祖籍的语言对吧”。正是这种祖籍身份的认同, 促使华人坚持对汉语方言的代际传播。受访者中, 有的父母把孩子从大城市带回老家, 学会方言, 在家里坚持讲方言。 “我的孩子出生在雅加达。在暴乱的时候, 我把他们带回了坤甸, 所以他们 3 个都会说客家话, 因为他们的祖母居住的环境全部都说客家话……回到雅加达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说客家话了。现在在家里, 他父亲……总是叫他们说客家话……不要说印尼 (语), 必须要说客家话。” 也有受访者表示在长达 30 余年的排华期间, 印尼政府关闭了华校, 禁止华人在公共场所使用中国话, 但华人仍保持在家庭和华人社群内部使用方言, 使得方言受到的影响比华语小, 仍然能保存传播下去。 “我认为对方言的影响不大, 因为他们在家说福建话, 老家 (棉兰) 的人也很多人说” “当时华校被封禁, 但还是很多人说, 是因为在家里父母要求孩子说。” 可以看出, 印尼华人在语言信念上具有明确的认知, 即方言是祖籍语言, 保持祖籍语言很重要, 在语言实践上, 他们坚持使用方言, 努力把方言传给下一代。他们的 “知” 和 “行” 充分体现了 “知行合一” 的重要性, 让汉语方言经历了时间和历史的洗礼, 得以代代延续。

(二) 汉语方言是印尼华人与祖籍地的情感纽带、学习华语的催化剂

当汉语方言作为祖语被父母传播至下一代, 华人对祖籍地的情感也得以延续。一受访者说, “华人 (感情) 还是很浓厚的……也许因为从小开始在家庭, 从爸爸、妈妈, 在我们心里就埋下了种子”。更重要的是, 华人在印尼经历数代以后, 汉语方言也许是后代记住祖先移民历史的一种凭借, 即汉语方言在一定程度上能唤起华人后代对家族移民史的记忆。我们访谈的 7 位受访者, 除了一位是第 26 代移民, 已不太清楚家族移民情况, 其余 6 位都能在访谈中说出祖先从中国移民到印尼的故事。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说祖籍方言, 也表示会听长辈用方言给他们讲家族的移民故事。家族移民史记忆承载了华人对祖籍地和祖国 “寻根” 的情感。

^① 由于华人源自移民, 不同的华人经历不同代次, 身份认同会比较复杂, 故调查中允许多选。

调查还发现,印尼华人对汉语方言和华语的态度不同,对汉语方言主要是情感认同。问卷中语言态度“感知情感价值”维度的均值是所有维度中最高的,高达4.20分;“传承方言的意愿”维度均值4.13,排第二;“家乡文化情感”维度均值为4.07,排第三。其中,“家乡文化情感”对“传承方言的意愿”有最大的显著正向影响效应(0.475, $p < 0.001$),也就是说,对家乡文化的情感,能最大程度影响华人传承方言的意愿。

另一方面,当被问到“汉语方言和华语哪个更重要”,84.14%的样本和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华语更重要。正如受访者所解释,“不是每个人都讲(我的)方言,使用国语(即华语)可以更好地和不同人沟通”。还有受访者指出,“华语目前来说……看到它已经开始走向国际,不,它已经是一种国际语言”。因此,华人对华语更倾向工具性认同,华语的重要性更多体现在其实用性和社会影响力方面。

关于方言和华语的习得,受访者认为汉语方言不用特意学习,可以通过社群内部的传播而习得,“福建话不用学……每个邻居都是福建人”;而工具性语言,则需要经过学习。访谈中,7名受访者有5名会说华语,其中4名是通过学校学会华语的。研究表明,具有方言能力,是华裔学生学习汉语(即本文的“华语”)的有利条件;掌握一种方言对于学习汉语和汉字都大有裨益,如汉语中一些对于外国人来说应该是十分难以理解的语法规则,对华裔学生几乎不很困难(李嘉郁2005);单韵鸣、安然(2010)发现华裔学生在汉字学习初级阶段字感强,书写速度快,偏误少。会说流利华语的受访者认同掌握方言对华语有促进作用,“虽然福建话与华语不同,但是相比雅加达人,(会说福建话的)棉兰人学中文更快一些”;方言和华语的部分可懂度也有利于他们学习华语,“(方言)对(华语)听和说有帮助,因为有一些发音相似”。可以预见,保持汉语方言的良好传播,能对华人学习华语发挥助推的作用。

(三) 汉语方言是华人强大的交际工具, 华族文化的海外印记

郭熙、李春风(2016)早就注意到汉语方言在东南亚国家华人交际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们调查发现,方言不仅是华人家庭中最重要的人际语言,而且在华人社会活动多个场域的使用率都仅次于印尼语,明显高于华语,在某些特定的场域(如华人家庭聚会)显示出比印尼语更强大的活力。方言也不局限于华人社群的使用,在某些方言通行的地区,还向本地社群扩散,向本地人传播。闽南话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棉兰的调查样本以闽南话为母语的占比高达89.19%,这个占比已大大高出粤港澳大湾区中通行方言粤语在居民中母语的比例49.40%,以及湾区居民掌握粤语的比例71.90%(单韵鸣,等2023),有理由认为闽南话是棉兰地区华人社群的通用语。闽南话还散布在不同城市,如调查中的另外两个城市雅加达和坤甸,也有部分样本母语为闽南话。闽南话也向当地人传播、华人社群内部其他方言转向闽南话、公共空间语言景观较多闽南话的传播等。移民可以改变语言关系,重塑区域性语言生态(韩晓明2021)。闽南话在华人的积极使用下,纵横传播交织,成为强大的交际工具。所谓的“强大”就是有扩张性,方言的交际功能实现了跨场域和社群的扩张。

汉语方言从两千多年前就跟随华人移民传入印尼,结果很多方言词语被借入印尼语,当今在印尼不同城市都不乏中国语言景观,其中很多都是汉语方言。可见,汉语方言融入当地社会,以汉语方言为载体的华族文化也随之部分融入,在印尼多元文化社会留下烙印,同时华族文化也成为了当地多元文化的构成要素。

综上,汉语方言在印尼承担了华人身份认同、祖籍地情感纽带、华语学习催化剂、交际工具、华族文化海外印记等多种社会功能,体现了郭熙(2017)所描述祖语“历史性”“象征性”和“资源性”的性质,但汉语方言特别是闽南话在印尼并未“边缘化”,反而是印尼社会多元语言中的重要成员。

五、结 语

华人的印尼移民史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开始拉开序幕。由于不同时期的各种原因，华人移居印尼经历了多次移民潮，他们带着自己的祖籍语言闽潮话、客家话和粤语在印尼生根、繁衍后代，经历千百年，其祖籍语言仍然在印尼流传，闽南话更是华人仅次于印尼语的常用语言。时至今日，3种方言的传播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汉语方言作为华人的祖语在印尼发挥着多种重要的作用，使印尼社会留下华族深深的印迹。拉斯韦尔（Lasswell）的5W经典传播模式，指传播的5种基本要素包括传播者（Who）、传播途径（In Which channel）、传播信息（即传播内容）（Says What）、受众（To Whom）、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Lasswell 1948）。库珀（Cooper1982：31～32）就语言传播归纳为7个基本问题：“谁、采用、什么、何时、何地、为何、如何”（Who、Adopts、What、When、Where、Why、How）。而库珀所说的语言传播更多的是和政府语言规划结合，就印尼汉语方言更依赖人际、社群传播的特点，笔者认为拉斯韦尔的5W模式更适合用于描述其传播过程。现把闽、粤、客方言在印尼的传播勾勒如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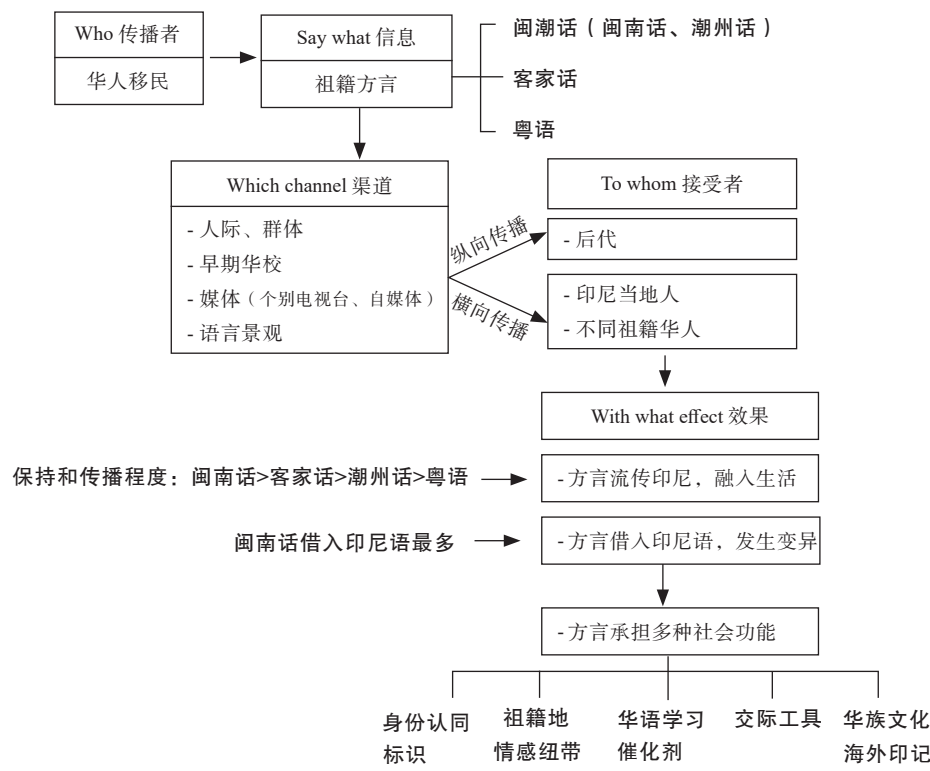


图6 闽粤客方言在印尼的传播——基于5W传播模式

汉语方言在印尼能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归功于华人对语言传播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对代际传播的世代坚持，因此，必须保护华人家庭良好的汉语方言生态。相比闽语、客家话，粤语在印尼的保护和延续显得更急迫。针对粤语代际传播出现的问题，应增强华人父母传授粤语的意识，提高后代对粤语功能价值和情感价值的感知（单韵鸣、茹靖雯 2022）。努力壮大组织传播粤语的力量，如学校开设粤语兴趣课堂、华文媒体引入更多粤语文化产品（如电视剧、电影、流行歌）等。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方言的传播主要依靠华人人际和社群传播，不管是实体组织（如政府、学

校)还是媒体组织(如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传播都非常有限,甚至呈缺位的状态。汉语方言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这和华语主要通过大众媒体、学校等组织传播有着较大的区别。

目前,华人传播汉语方言的动力主要源自情感,即对祖籍地的情感依恋。为了让传播能长久持续下去,还需挖掘海外方言更多的功能价值,如进一步加强中国、华人祖籍地和海外华人的经济文化交往等。

通过管窥汉语方言在印尼的传播,不难看出华人是中国话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融入当地的同时,把中国话和中华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对当地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论现在还是未来,中国话的海外传播都值得重视。日后应根据不同国家华人传播中国话的情况,细致探讨传播的共性、特点及面临的挑战、对策,以推动中国话在海外的延续和发展。

参考文献

- 鲍立刚 2022 《中国人迁移印尼的历史变迁与贡献》,《边疆经济与文化》第12期。
- 陈佩英 2008 《印尼坤甸潮州方言词汇研究——兼谈印尼华裔学生的汉语教学》,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陈晓锦 2012 《东南亚华人社区闽南方言的唇齿清擦音f声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陈晓锦,郑 蕾 2009 《海外汉语濒危方言》,《学术研究》第11期。
- 陈玉兰 2012 《浅谈印尼语中闽南语借词的形态适应》,载王建设,孙汝建《第二届汉语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FITRI WILIM(林瑰丽) 2016 《印尼语中闽南语外来词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甘于恩,单 珊 2013 《印尼“先达国语”词汇语法特点概说》,《华文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高 然 2000 《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闽南方言》,载李如龙《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郭 熙 2017 《论祖语与祖语传承》,《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 郭 熙 2021 《主持人语:华语与华语传承研究再出发》,《语言战略研究》第4期。
- 郭 熙 2023 《海外华语传承的历史经验与国际中文在地化传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郭 熙,雷 朔 2022 《论海外华语的文化遗产价值和研究领域拓展》,《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郭 熙,李春风 2016 《东南亚华人的语言使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双语教育研究》第2期。
- 韩晓明 2021 《“移民-扩散型”语言传播及其特征——以东南亚汉语传播为例》,《民族教育研究》第3期。
- 孔远志 1986 《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从闽南方言借词看闽南华侨与印尼、马来西亚人民的友好关系》,《华侨历史》第1期。
- 李计伟 2023 《南洋华侨的祖语传承:应变与植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李嘉郁 2005 《汉语方言与华文教育》,《侨务工作研究》第6期。
- 李如龙 1997 《略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学术研究》第9期。
- 李学民,黄昆章 2016 《印尼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廖健裕 1978 《现阶段的印尼华族研究》,新加坡: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 林瑀欢 2021 《印度尼西亚华人祖语传承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单韵鸣,安 然 2010 《华裔学生汉字书写特征的个案研究——基于与非汉字圈学生的比较》,《华文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因版面不足,以下参考文献从略,可在中国知网上阅读、下载完整版)

责任编辑:逯琳琳